

云南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昭通地区昭通市资料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

昭通地区昭通市文化局舞蹈集成办公室编

二〇〇〇年五月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

昭通市资料卷

昭通市文化局
昭通市文化馆 编

领导小组

组 长：杨廷荣

副组长：易正林 韦妙生

成 员：倪桂祥 张连生 杨世武

潘忠福

张观玉 张正莲 李启龙

主 编

王 苇

宋兴菊

副 主 编

倪桂祥 杨世武

校 对

倪桂祥

杨世武

民族和舞蹈分布图:

倪桂祥

概况和汉族概述:

潘忠福

苗族概述和舞蹈介绍:

杨世武

舞蹈整理和场记:

倪桂祥 杨世武

场记图:

倪桂祥

白 描:

张连生

音 乐:

倪桂祥 杨世武

(苗族部份)

杨世武

(汉族部份)

倪桂祥 杨世武

摄 像:

李启龙

摄 影:

张观玉 张正莲

目 录

概 况 (1)

一、汉 族 (9)

(一) 概 述 (9)

(二) 舞蹈介绍 (13)

1、《四筒鼓》 (13)

(1) 简 介 (13)

(2) 音 乐 (17)

(3) 服饰、道具 (17)

(4) 舞蹈动作 (18)

 苏甲区 (19)

 洒渔区 (52)

 乐居区 (79)

 土城区 (90)

2、龙 舞 (102)

(1) 简 介 (102)

目 录

3、狮 舞	(103)
(1) 简 介	(103)
4、蚌壳灯	(103)
(1) 简 介	(103)
二、苗 族	(105)
(一) 概 述	(105)
(二) 舞蹈介绍	(110)
1、芦笙舞	(110)
(1) 简 介	(110)
(2) 音 乐	(112)
(3) 服饰、道具	(115)
(4) 舞蹈动作	(117)
三、艺人简介	(126)
四、民族节日调查表	(129)
五、民族舞蹈调查表	(131)
六、民间艺人登记表	(133)
后 记	(135)

概 况

昭通市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历来是三省经济、文化及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纵距四十三公里，横距六十一公里。东接贵州省威宁县，南与鲁甸县接壤，西隔金沙江与四川省金阳县相望，北和永善、大关、彝良县毗邻。全市总面积为二千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其中：坝区面积为七百二十七点七七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山区面积一千三百九十二点六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三；江边河谷地带四十六点六三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一。一九八四年底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八人。

昭通市地形的总趋势是西高东低，由于金沙江水系及无数深谷沟壑的切断，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小区地形。全市大致分为六类：高原湖积盆地；河流冲击盆地；岗岭起伏山地；高原深谷；江边河谷地带；高山丘陵。境内最高峰为大山包区的独石包，为海拔三千三百六十四米；最低点为大寨子区的茅坡，为海拔四百九十四米。城市最高点是北正街，为海拔一千九百三十米；最低点是爱民路，为海拔一千九百一十四米。随着海拔气候分三种类型：高寒山区海拔二千七百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七摄氏度，年降雨量一千二百毫米，无霜期九十天；江边河谷区海拔一千米以下，为亚热带气候，无霜期三百天以上；其余地区为暖温带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二百一十天左右。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尤以三、四月的“倒春寒”和八月的霜冻对农作物危害较大。

境内各河流均属金沙江下游水系，主要有三：金沙江、洒渔河、

盘河。

昭通市辖十四个区，四个区级街道办事处。一百五十二个乡（镇）。在一百五十二个乡（镇）中，有区辖镇十一个，民族乡二十二个（其中：十三个回族乡、二个苗族乡、六个回族彝族乡、一个回族苗族乡）。据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五十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八人。有汉、回、彝、苗、白、壮、傣、纳西、哈尼、布依、傈僳、满、黎、水、侗等十五个民族杂居。除汉族外，回族有五万七千一百九十四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零二；彝族有一万二千七百一十三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五；苗族五千一百二十一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三种为世居少数民族。还有白族一百七十人，壮族一百五十一人。其余少数民族各在百人以下。

昭通夏朝属禹贡梁州。周代称为“宴地甸”秦汉间为夜郎国地。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置朱提县，属犍为郡。蜀汉时分犍为郡地立朱提郡，朱提县为郡治所在。东晋至宋、齐仍称朱提郡。唐置曲州。唐南诏、宋大理时为乌蒙部地。元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立为乌蒙宣抚司，后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明初置乌蒙军民府，初属云南，旋改属四川。清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仍改属云南。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改乌蒙为昭通府置恩安县，为府治所在。民国废府，设昭通县，解放后属昭通专区。一九五八年鲁甸县并入昭通县，一九六三年昭鲁分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划城关镇及郊区部分社队成立昭通市，保留昭通县。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撤销昭通县并入昭通市。

昭通虽然历史悠久，开发较早，但由于封建制度长期占统治地位，加之交通不便，生产工具原始以及灾害频繁，技术落后，致使生产力很低，经济贫困。解放前农田固定耕作，以种植为主兼有畜牧业和林业。工业更是薄弱，只有一台八十千瓦小发电机发电供城市照明用。

土织布机遍及城乡开展家庭纺织。其它还有毡业、皮货、打铁等小手工业。主要产品只有六七种。一九四九年工业总产值二百三十三点二万元。

解放后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八四年粮食总产量三亿三千零一十一万斤，比解放前增长二倍多，各种经济作物也有大幅度发展。工业企业发展到二百三十一一个，总产值达六千八百八十三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十九点五二倍。由于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我市由于立体气候，农作物品种繁多。其中以烤烟、包谷、水稻、洋芋为主。每年可提供包谷、稻米、豆类、荞子、燕麦、洋芋等商品粮三千五百万斤至四千万斤。烤烟和苹果是两大“拳头”产品，在农业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

二

我市历史悠久，有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据载周代王朝名昭通为“夔地甸”，反映出昭通文化与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之交昭通焚人首领杜宇率众进入川西平原，建立蜀国，昭通是蜀国的园苑，更加说明昭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血缘关系。秦开五尺道自宜宾经昭通至曲靖，进一步维系了边疆与中原的交往。我市先后出土了大量文物，如一九八二年在北闸区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五至十万年前的人牙化石，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称为“昭通人”，证明我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在我市出土了大量汉砖，有的上面有清晰的舞人形象。又出土了一具石棺，上面也有清晰的舞人形象。说明我市早在汉代就有舞蹈流行。此外，还有铜洗、五铢钱等，均属汉代文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孝琚碑”，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年）出土于守望白泥井现藏于地区第三中学汉碑亭内，属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此碑出土时缺上截，至今未发现。碑文为隶书十五行，每

行残存二十一字。左有龙纹，右有虎纹，下有龟蛇纹。据考，此碑可能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一五七年）之物。碑文记述墓主孟孝琚生平，他原名孟广宗，字孝琚，十二岁随父到武阳（今四川境内）学韩诗、孝经，博览群书，未婚而死。其父下属刻立此碑以慰亲属，碑的体形、文字、书法都表现为东汉时期盛行的风格，为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和中国书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被誉为“滇中瑰宝”。

又于一九六三年在我市后海出土了一座招魂冢（即衣冠墓）“东晋霍承嗣壁画墓”，墓为复斗式石室，与中原的墓制相同。此墓建于东晋太原十年至十九年（公元三八五年至三九四年）属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壁上绘满题材丰富的壁画。其中有主人、侍从、家丁、部曲、金童、玉女等七十多个人物，风格古朴粗犷，形象生动逼真。它反映了当时的祭祀场面。墓主头戴平顶小帽。身穿袍式长衫，盘膝坐于蒲垫上。右上方有八行墨书铭记：霍氏曾官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西、古兴三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进封成都县侯。在壁画的部曲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形象，梳天菩萨髻，身披披毡，赤足，近似今彝族的装饰。证明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昭通市就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随着时代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据有关资料：我市境内彝族很久以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由于使用较少，古彝文仅为布孃、孃寿所掌握。彝文中记载着许多诗经，韵脚整齐，文词优美，想象丰富。使用了排比、拟人、比喻等手法。上层人物每逢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如十月节（彝族年），清明扫墓等。婚事、丧葬的仪式与节日的仪式略同。这些仪式都由布孃主持并念诵经文。布孃精通彝文，他们是彝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

本市境内的苗族有花苗、白苗两个支系，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

文字。以农耕为主，属于本市三种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苗族中流传着很多古歌、情歌、山歌、传说和故事。他们能歌善舞，芦笙舞是苗族的传统舞蹈。

回族“考之史籍，远在元朝初年，就有数千回民从昆明、大理等地到达昭通从事屯垦。明初，回族将领傅友德、兰玉、沐英、胡大海等，曾率领江南和西北的部分回民到威宁、昭通、鲁甸落籍；哈元生将军又率领河北、西北的大批回民领土占籍于昭通天梯为中心的东、南、北一带高原，与其它民族一道，筚路蓝缕，开发了昭通。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子孙得以繁衍，经济文化得以发展，以‘四十八所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局面，即以这时始成”。（引自《昭通文史资料选辑》中的《昭通地区回族简史》）。

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汉人之入昭，旧志谓初汉，唐蒙开西南夷设立郡县，官与兵吏悉皆流禹（寓）于此。”这和大量出土文物相印证：昭通在汉代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汉族文化对昭通已有影响。真正汉族文化对昭通产生巨大影响是元代以后的事。史料载：“元置宣慰司，调云南、四川兵屯田，计有汉民三千余人，为数已不少也……所有大族又皆雍正间平定后，迁徙云南（祥云）、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此一因也。即建城之时，招募砖瓦木石金工匠等，并来自各省。迨工既竣遂相率留籍，此又一因也。”对几个主要阶段汉人入昭的原因已说得很清楚。加之昭通与川、黔相邻，客商云集；乾隆年间乐马厂大旺，湖广人、江西人及闽粤等人民也闻风而来。久之，则安居乐业，并立会馆以聚同乡……汉人大量迁入昭通，对昭通文化的兴旺发达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庙宇、古戏台、戏剧、歌舞等文化艺术不断发展，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又各具特色，同时并存的传统文​​化的特点。

三

昭通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汉、苗、彝等民族中。目前已搜集到的有十多种，即汉族中流行的有《四筒鼓》、《龙舞》、《狮舞》、《巫舞》、《腰鼓》、《秧歌》、《蚌壳舞》、《旱船》、《车灯》、《高跷》、《金钱棍》等；苗族主要有芦笙舞；昭通彝族绝大多数与汉族杂居，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衣着、习俗基本与汉族相同。因此，目前尚未搜集到彝族民间舞蹈。此外，《民国昭通县志稿》载：“铜鼓由昭通瑶（瑶）堆中先后掘获二具，一为陈铎购去，今不知何所；一现藏李氏家庙。形如坐墩，其下空，满被花纹，击之，声如鞞鼓。相传为武侯征南蛮时所制。一说盖古蛮人所用。因无文可考，未稔孰是？”既然有铜鼓实物资料载于文献，昭通古老的民族中是否还有铜鼓舞？待考。

这些舞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大概可分为这样几种形式：

- （一）独舞：巫舞（师娘跳，驱鬼怪）。
- （二）双人舞：旱船、蚌壳灯、车灯。
- （三）集体舞：四筒鼓（男性）、芦笙舞（男性）、腰鼓、高跷、龙舞、秧歌、金钱棍、狮舞、巫舞（道士跳绕棺）。

这些舞蹈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三种：

- （一）表演性：狮舞、龙舞、蚌壳灯、车灯、金钱棍、秧歌、腰鼓、旱船。
- （二）祭祀性：四筒鼓、龙舞、巫舞。
- （三）自娱性：芦笙舞、高跷。

不管从形式或内容的划分都只能以侧重而言，不是绝对的。例如苗族的芦笙舞，同是一个曲调（一个舞），可独舞、双人舞、也可以集体舞。又如《四筒鼓》的八十多个套路中，很多套路是模拟动物的

（特别是《蚂蚱舞》）表演性很强，它既有祭祀性，又具表演性。其还有一部分舞蹈同时兼有两种性质和作用。如龙舞兼有表演和祭祀性质。

我市民族民间舞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情趣和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四筒鼓》中的《猴子抱瓜》表现了摘瓜、搬瓜等劳动过程；《旱船》、《蚌壳灯》生活情趣相当浓厚；《巫舞》则是对鬼神崇拜的反映。总之，随着历史的前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相交流和渗透，为民间舞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但各民族的舞蹈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从中可以探索当地各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脉络。

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在我市各族人民生活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具有广泛深刻的人民性，因此久而不衰。它的作用在于：

1、歌舞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我市苗族在新婚之夜客人盈门，通宵达旦在芦笙舞中边向客人敬酒，边唱古歌，逢花山节时更是热闹非凡，各寨子苗胞欢聚一起，吹起芦笙跳起舞，一寨赛一寨，有“比赛武（舞）艺”之说。汉族也是如此，天旱时舞水龙，祈龙降雨，以保丰收；春节期间龙灯、狮灯、高跷、旱船等等，活跃在街头巷尾，为节日增添异彩。办丧事时，在出殡的头一天，丧家用《四筒鼓》中的“座堂鼓”迎接前来烧纸、上祭的客人和后家、家族、亲家等亲友请来的《四筒鼓》舞队；丧家的亲朋好友有的还保持着通宵守灵唱孝歌的习俗。作用有两个：一是悼念死者，二是以乐致哀。可见民间歌舞在群众生活中的地位。

2、歌舞是进行社交活动、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我市每逢节日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民族民间歌舞活跃在城市和农村。人们通过歌舞结识朋友。特别是青年男女，歌舞为他们搭起了通往幸福的桥梁，使多少有情人成为眷属。它成了重要的社交手段。过去，

少数民族由于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本民族文字仅掌握在少数上层人物手中。于是，对本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来历只有靠歌舞的形式传给下一代。在歌舞中，有很多内容是歌颂英雄，赞美勤劳勇敢、道德高尚的人；嘲笑懦夫懒汉和对爱情朝三暮四的人，对于维护民族的伦理道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3、民族民间舞蹈不但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如苗族的芦笙舞，汉族的《四筒鼓》等，内容丰富，活动频繁，是一种剧烈而有规律的运动。通过舞蹈增强了艺人们的身体素质，有利于生产劳动。

总之，我市现已调查到和搜集起来的各种民族民间舞蹈，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 族

(一) 概 述

汉族是我市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居住城市和农村各区乡，语言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

据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设立郡县，置朱提县（今昭通市），属犍为郡。官与兵吏悉皆流寓于此。”说明汉初便有少数官吏、兵丁进入昭通。“元置宣慰司，调云南、四川兵屯田（昭通），计有汉民三千余人。”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算少。真正大量汉族进入昭通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特别是在建新城（现城市）时，“招募砖、瓦、木、石、金工匠等，来自各省……竣工后相率留籍。”乾隆年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等省汉民不断入昭，并“立会馆以聚乡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戏剧、歌舞等汉文化蓬勃发展起来。至清代后期，汉族已成为昭通市人口最多的民族。

昭通汉族的服饰与中原基本相同。随着朝代的更换，时代的前进，服饰随之而变化。再者，根据年龄、性别和各自的喜爱，红、橙、黄、绿、青、蓝、紫各取所需；对襟衫、姊妹装、长旗袍、短紧袖乃至猎服、西装随其所好，无一定规格，不必赘述。

汉族婚姻在过去实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解放后贯彻《婚姻法》，废除封建包办，男女自由恋爱结婚。一般还保留着宴请宾客的习俗。但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可奢可俭，与内地相似。

丧葬在昭通汉族中习惯于棺葬并保持着跳《四筒鼓》的习俗。

《四筒鼓》据《昭通志稿》卷九第二十二页《物产志》附方物载：

“四筒鼓，形长削木为之两头蒙以皮乡人丧礼用之以以为跳舞。”（《昭通志稿》序：“本志自汉代起迄于清宣统三年止，一切事实均系未改县以前者，故定名昭通志稿。”）由此可知，《四筒鼓》起码在清宣统三年以前昭通乡间在丧葬中就广为流行。但具体起源于何时，目前还难以找到充足的史料依据。民间有几种传说：

①过去有一家人有四个姑娘，找了四个姑爷。后来姑娘的老人死了，四个姑娘和姑爷前来奔丧，四个姑娘守着灵床哭啼，无休无止，任凭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四个姑爷觉得老是这样哭哭啼啼不能解决问题，应该设法把老人热热闹闹送去安埋。于是，四个姑爷商量：决定每人做一筒鼓。鼓做成后，四个姑爷边打边跳，鼓声咚咚，舞姿优美，节奏欢快，气氛热烈，一家人热热闹闹把老人送上了山。

②从前有个部落的首领死了，准备无声无息地抬去安埋。袭父之职的儿子认为送老人上要有点响器才热闹，于是下令搞了四筒鼓。以后，谁家死了老人就敲四筒鼓，人们听见响声就会赶来参加送葬。达到了热热闹闹把老人送上山的目的。

③某朝有个国王到别的国家去被刺死了。文武大臣一致认为主上尸首不能留在异国，一定要想办法把尸首弄回国来。怎么办呢？哭哭啼啼会引起别人注意，不但不行，还会坏事。想来想去，想出个新鲜玩艺儿——四筒鼓。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一切就绪了。于是，打起鼓，跳起舞，欢欢乐乐去到那个国家。欢快的鼓声，优美的舞姿把人们吸引住了，看得如痴如迷，就在《四筒鼓》的掩护下，顺利地把国王尸首弄回本国。又用《四筒鼓》伴随国王灵柩，热热闹闹举行了国葬。从那时起，谁家死了老人都要跳《四筒鼓》。

传说归传说，作为舞蹈起源，根据是十分不足的。任何一个成熟的舞蹈不可能因一时一事便能形成。比较可靠的是下面几个口碑材料：

①乐居区乐居乡孔令芳（六十六岁）说：听爷爷说，爷爷的祖辈就有《四筒鼓》，至今大概有三百年历史。

②乐居区坪子乡陈仁平说：他家明朝时从南京出发向云南迁徙，

康熙二年九月建家祠，当时就有四筒鼓置祠堂内。可惜祠堂早已拆除，修建粮管所，不存依据。据陈氏家谱记载，陈氏入滇定居，至今已有十四代人。如此事属实以康熙二年计：《四筒鼓》至少有三百二十多年历史。

③苏甲区小松树乡邢德忠老人（八十岁）说：“他小时候听爷爷说：我的先祖时就有《四筒鼓》。我奶奶死时我才十一岁，记得院子里四筒鼓都摆满了。”

④苏甲区和平乡房成云老人（八十五岁）说：“老祖时就有四筒鼓。我小时候看见死了老人的人家就跳《四筒鼓》。当时没有其它响器，只见四筒鼓。”

从上述口碑材料可以看出《四筒鼓》舞在昭通流传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这和元、明、清大量汉族进入昭通，他们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三个民间传说都强调了老人升天应该热热闹闹送上坟山去安埋。因此，《四筒鼓》节奏欢快，气氛热烈，没有悲哀的表现。乍看起来好象与丧葬无关，实际是以乐致哀。所以，民间有红、白喜事之说。

《四筒鼓》最先是由四个人（男性）每人挎一筒鼓边打边舞，但套路不多，古朴单调。随着时代的发展，艺人们增加了锣、钹、镲、扁鼓、红绸、哨子等，舞队由四人发展到九至十一人。《四筒鼓》中分“座堂鼓”（丧家请的《四筒鼓》舞者），“后家鼓”（死者后家请来的舞者），“亲家鼓”（以姑娘、姑爷的爹妈相称，老人升天时由对方请来的舞者），“家祭鼓”（家族间请来的舞者）等四种。丧家在请帮忙客的同时便把“座堂鼓”请到家中。在出殡的前一天，农村称为“发丧”，烧纸、上祭的亲戚、朋友在这一天纷纷而至（如果请有《四筒鼓》也随之而到）。“座堂鼓”负责在灵堂外面迎接。一般跳《小牛拜四方》、《十字过江》等套路。不管哪家请来的《四筒鼓》舞队，都以死者为大，必须先到的灵堂门口跳套《双龙抱柱》后，以《蛇蜕皮》进入灵堂。死者是男性从左，是女性从右绕棺舞一周，表示对死者的悼念，然后退出灵堂。在出殡时，“座堂鼓”领先，“后家鼓”紧跟，

以下论资排辈，井井有条，前后左右围棺“跳鼓”。直到招灵后方散。（上述几种鼓队不是固定的，根据丧家实际情况，少则一两拨，多至十几拨或几十拨不定。）现已搜集起来的《四筒鼓》比较固定的成熟套路达八十多个，内容丰富，舞姿优美，欢快活泼，气氛热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所以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

宗教方面有部分人信仰道教和佛教。耶稣天主教和耶稣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有少数人信仰。

传统节日有春节，正月十五小年，正月十六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六月廿四火把节，七月十五中元节，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至初十称“十月朝”。（月、日均属农历）。

民间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有山歌、小调、孝歌、童谣、谚语、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民间舞蹈有《四筒鼓》、《龙舞》、《狮舞》、《蚌壳舞》、《车灯》、《旱船》、《高跷》、《金钱棍》、《巫舞》及解放后传进的《腰鼓》、《秧歌》等。